

2101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

專輯之一

(總第九輯)

1177/32

编 者 的 话

今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八年抗战的历程，是一部气吞山河，威震寰宇的悲壮史诗。中国共产党受命于民族危亡之秋，率领全国民众，奋起抗战，前赴后继，力挽狂澜，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坚持了深入持久的全面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和政府官员也积极参加和坚持了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千个浴血奋战的日夜，千百万志士与人民的流血牺牲，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壮烈的诗篇。

为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永远铭记在抗日救国斗争中英勇捐躯光荣殉国的烈士们，为了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为努力实现党在新时期的三大任务和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本会特选编并连续出版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资料专辑数册。将分别刊载有关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川军出川抗战、为国捐躯将士、远征军赴缅印抗战、四川和成都人民对抗日救国所作贡献以及日寇给成都地区带来的灾难和抗战引起的变化发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而且大都是抗日时期各有关方面人士回忆撰写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史实，亦有党史、文史、档案工作者认真搜集整理的重要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可供各级领导、史学界人士、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与大中小学教师、工农群众与青年学生以及其它各方面社会人士阅读、研究或参考。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八月

求民族生存而戰

張治中題

國難當前
同胞猛省

秦廷鑑題

三六三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欢迎冯玉祥、老舍合影。前排身体高大者为冯玉祥、冯左为老舍。郭有守。



↑ 一九三七年八月，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领袖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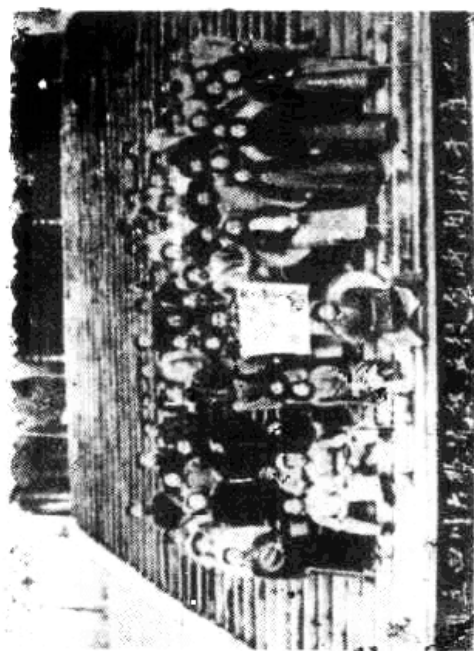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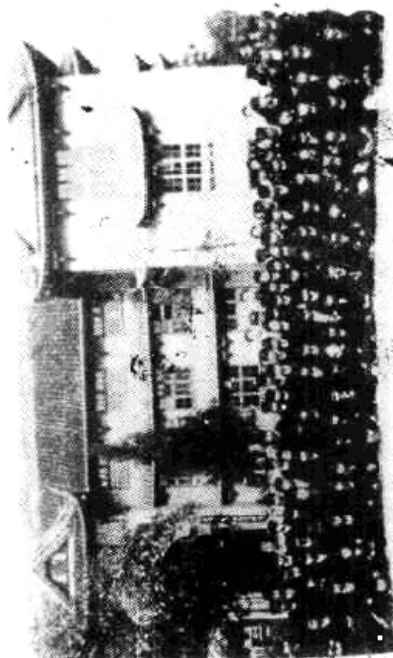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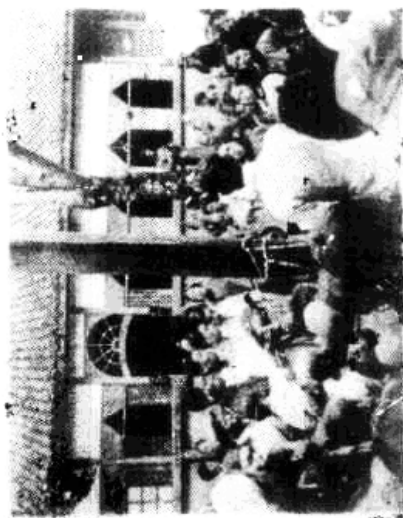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六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成都，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魏斯露斯家，左起周曼如、郭明、胡绩伟、美国代表、张文澄、（成都市党史工委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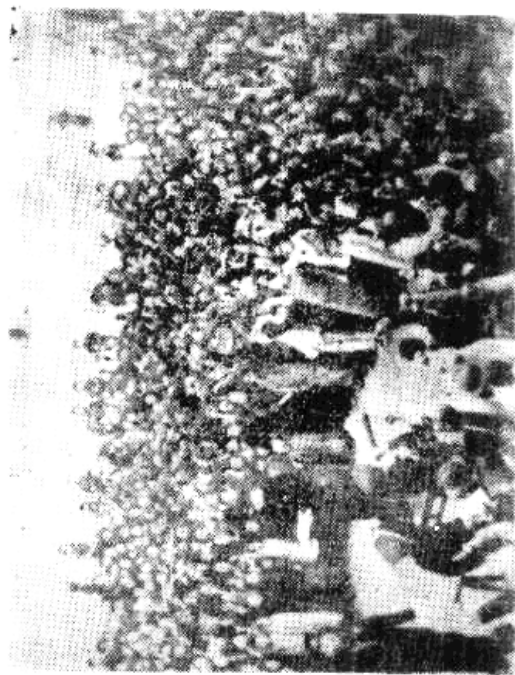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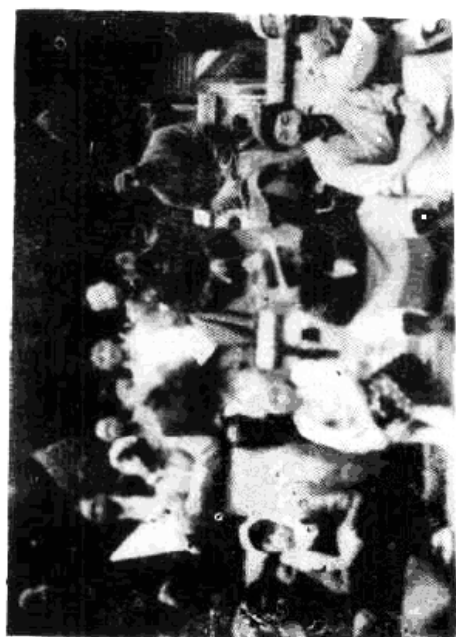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成都难民营（成都市党史工委供稿）
 一八九年兴学团与院西院（党史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川大学宣传团在灌县抗敌（成都市党史工委供稿）
 一九三五年，华西歌咏队抗日（成都市党史工委供稿）
 一九三五年，华西歌咏队抗日（成都市党史工委供稿）



西大传新出合(成)委工供
 华五宣去演束(市史)供
 则学队繁结影都党委(稿)



↑ 成都市民在少城公园举行宣读国民抗战
 公约大会

(成都市第一档案馆供稿)

← 成都各界救国会成员去天迴镇宣传途中

(四川省博物馆供稿)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目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之一〕

余明同志谈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杭州访问的录音

……………罗宗明整理 (1)

忆抗战初期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洪沛然 (9)

记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出川抗日救国

活动……………葛诗雄 (14)

抗日期间成都地区进步刊物简介

……………抗战时期四川的进步刊物编辑组 (29)

呼吁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的：

《大声周刊》的前前后后……………肖志康 (39)

《大学月刊》的产生和发展……………王迪先 (51)

《抗日先锋》简介……………张迪明 (65)

《力文半月刊》的始末……………廖友陶 (67)

对《〈力文半月刊〉的始末》的一点补充……………徐庆坚 (77)

抗日战争时期的祠堂街……………潘清雍 安德才 (82)

抗战期间成都的图书发行情况……………张毓黎 (94)

抗战期中冯月樵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黄稚荃 (107)

“七七”事变前后川大的抗日民主运动

……………王宗力 张 明 蓝明春 (112)

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王光媛 (137)

抗战期间迁蓉的燕京大学……………燕大成都校友会整理 (164)

抗战时期迁蓉的中大医学院……………罗建仲 何光侃 (180)

抗战期间迁蓉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肖鼎瑛 (184)

抗日时期的成都“抗大”——朝阳学院

……………黄飞声 傅 楨 (191)

抗战期间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孙 恭 (200)

我所知协进中学在抗战初期的救亡活动……………李永白 (211)

忆抗战末期轰动西南的成都学生大游行

——记成都市立中学事件……………汪克永 (216)

抗战期中战斗在成渝等地的中华剧艺社……………张逸生 (225)

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车 辐 (243)

记在郫县的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抗日救亡活动

.....郫县党史办公室 (251)

忆反动派破坏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李 英 (255)

忆成都抗日救护班的活动及其遭受破坏的经过

.....张元佑 (269)

作者·读者·编者..... (279)

· 小 资 料 ·

九一八事变..... (8)

一二八事变..... (13)

塘沽协定..... (190)

何梅协定..... (76)

八一宣言..... (81)

一二九运动..... (93)

瓦窑堡会议..... (163)

西安事变..... (199、242)

七七事变..... (254)

余明同志谈“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杭州访问的录音)

罗宗明整理

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四川青救）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七·七”抗战爆发前后，黎储力（张黎群）、肖泽宽、董仲平三同志从上海经西安到延安。董留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黎、肖二人带着“西北青救”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先回到成都。董仲平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才回成都。当时中共中央青委在延安，它与各地联系不方便，主要是通过设在西安的“西北青救”与各地青年救亡组织发生联系和指导工作。黎、肖二人与“西北青救”的组织联系人是谢华，通讯联系人是西安师范的蒲望文。西安《救亡》周刊与成都《救亡》周刊互相交换学习参考。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出狱后，到处找党组织，找过成都业余读书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海燕社、成都民先队等，但都不是党组织。黎储力、肖泽宽到成都后即来约我（当时我在成属联中读书），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文件，虽然当时思想上没有“青救”这个概念，但发现这个组织更接近于党的组织，就把他们看作C.Y，并认为这是新时期C.Y的组织形式，于是我就积极支持这个组织的建立，叫他们多约一些人，只要赞成抗日，不管在团体不在团体都可邀约。我们邀约的大都是从上海回来的大、中学生以及海燕社、民先和学联的成员。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在一个同志家的二楼大厅里（记不清姓名和地点了），召开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参加成立会的有黎储力、肖泽宽、胡道南（由上海转学川大）、杨汇川（同

上)、杨真贤(搞音乐的,后去万县)、徐天宇(川大)、张文澄、沈荫家(华大)、许承信、刘承惠(林珈)、周平、王德琼(李白蕾)、吴德让(川大)、洪润芳(现名洪泽钧)、王世焕(川大)、徐坚(川大)、杨毓同(成公中学)、贺遐令、邱淑云,和我等三十多人(熊复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上成立了七、八个部,并进行分工,以便分头开展活动。

青年部 王世焕 后沈荫家

学生部 余 明

联络部 黎储力 (张黎群)

宣传部 胡道南 后张文澄(?)

出版部 肖泽宽 后王世焕

总务部 洪润芳

聘请顾问 刘中莹(某中学教员),以后是廖文彬。

“四川青救”下面建立了两个群众团体:

一个是“大众读书会”。由杨汇川负责,参加的大部份是女同志。如王德群、周平、陶慕苏(贵州人)、崔××(职业学校教书)、杨毓同(杨静)、王涛、邱淑云、吴××(我介绍去延安的)、刘承惠(林珈)等。男同志有薛舟明、高××、何郝炬(一九三七年冬去延安)等,还有两个职业学校的教员。以后又吸收了成都生活书店的诸度凝、张文星等五个人(我曾领导该支部)。这个读书会的成员总共约二、三十人,其中少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大众读书会”每周开一次会,我则每会必去,实际上是领导这个读书会。它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都是在同志们的家中。

稍后,各救亡团体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都纷纷改名为抗敌宣传团,“大众读书会”也改为“大众抗敌宣传团”,设在杨汇川家的客厅里,由张成仁任团长。这时,大众抗敌宣传团就可以公开上街和下乡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了。记得有一次在西玉龙街(?)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把群众团拢来以后,杨汇川便绘

声绘色地讲述了“法帝国主义侵占越南后，法国人竟把越南人当马蹬，踏上马之后又一脚把越南人踢开的当奴隶的悲惨命运。”接着就大声急呼地说：“中国人民必须起来抗日，决不能当亡国奴！”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我和张黎群先后介绍了七、八个“大众”的会员去延安。

“四川青救”领导的另一个群众团体是“救亡周刊社”。

“四川青救”成立后不久，便仿照“西北青救”的作法在成都创办了《救亡周刊》，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出刊。《周刊》的前三期由熊复主编，后因熊复转移工作并准备去延安，改由王世焕主编，我也参加审稿和编辑。但我的重点是搞组织工作，张黎群搞联络工作。为了有一个固定的阵地，便于组织联络、发展社员和培养救亡骨干，特成立“救亡周刊社”。社址先设在祠堂街靠公园河边一间房子楼上，后迁至街对面的一家店铺楼上，我和张黎群常在那里。

楼下设赁书部，由“救亡周刊社”的社员搜集、募集和购买的进步书刊出借。以这个赁书部做抗敌宣传和联系群众的工作，效果很好。赁书部开始由谁负责已记不清了，后来是江启明同志负责。以后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社”，由刘熔铸同志负责，还有廖萍（女）也协助过。

开会和接待外地的同志都在楼上进行，如宋徽青、肖章銓等都是在那里与我接的头。曾发现有一对姓王的夫妇，经常坐在“救亡周刊社”的店门口，我们下乡宣传、演出他们也跟着去，后来发觉是特务，就把他们甩掉了。不久，“救亡周刊社”也和“大众读书会”一样改为“救亡抗敌宣传团”。

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抽出力量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及建党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救亡周刊”与“星芒报”合并为“星芒救亡联合周刊”，同时，大量吸收新党员。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救亡周刊”与“星芒报”又分开各自继续编辑出版。“救亡周刊”开始只有一、二

十人，完全是自己出钱办刊物，发行量从八百份增至一千二百份左右，发行范围包括隆昌、万县、新津、灌县、邛崃、贵州遵义（仅此一地即有15份左右）等省内外各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联络点。

“四川青救”与“西北青救”只有通讯联络，并无政治性文件往来，更不是领导关系，但介绍革命青年去延安却是由他们转送的。我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从吴玉章同志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学得的。这个报刊先由上海转寄，后由香港转寄。

“青救”是秘密组织，它与“民先队”也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民先队”骨干如张文澄、沈荫家、许承信、林珈、洪润芳和我等，都是“四川青救”的成员。“民先队”也知道有“四川青救”这个组织，那时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是存在的。有一次张文澄同志拿着成都文艺界救亡协会筹备组的名单来，要求“四川青救”按照暗线显示的名字投票选举。“四川青救”认为应参加两、三个同志进领导班子。可是选举结果没有“青救”的同志。于是，曾对张文澄等产生了误解。我与王世煥、张黎群商量之后，召开了“四川青救”各部负责人会议，我们提出“现在的形势既然有民先队这样一个大组织，我们可以不必另立旗帜，四川青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正有些同志是民先队员，解散后各自参加民先队的活动。”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宣布解散“四川青救”。事隔两三天后，又避开了张文澄、沈荫家、许承信三同志，重新召开“四川青救”会议，并进行了新的分工，因而“四川青救”照样活动，依然存在，这是“民先总队”不知道的情况。当时，我还担任“民先”第二区队队长，洪润芳为区队委员，另一委员是川大的尹志祁。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同志回四川建党，并统一领导四川抗日救亡运动。十一月，邹、廖二同志抵成都，廖先住在西御街一个旅馆，找到张黎群和我（张与廖见面后

约一周左右，便离开成都去延安），半个月后，搬至春熙路青年会所属的旅馆。我去廖志高处，竟意外地见到了邹风平（我们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富顺牛佛渡开川南中心县委联席会时认识的），一周后恢复了我和廖文彬（刘光弟）、江启明的党籍，我们三人建立了临时支部，廖文彬任支书。邹风平直接领导我们，首先给我们讲政治须知即党的新路线和新政策，以及党员须知、支部工作、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一个多月后，我把“四川青救”中的骨干分子分别吸收入党，成立了“四川青救”支部，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我改任“青救”支部书记，撤销了临时支部。“青救”支部直属省工委领导，每次开会廖志高同志都来参加。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当时，省工委又下设工委、学委、妇委、文委。学委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成立，由韩天石（书记）、康乃尔（组织）、余明、王世焕（宣传）和徐坚（委员）五人组成。我和王世焕、徐坚参加省工委学委工作后，“四川青救”党支部便撤销了，洪润芳任成公中学党支书，我兼任成属联中党支书。不久，徐坚调离，由张文澄为学委委员。五月，韩天石调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康乃尔任学委书记，张文澄任组织部长，我仍担任宣传部长。学委领导成都各学校党支部和学生运动。这期间，川大的文法两院、协进中学、天府中学、中华女中、省师、成公中学、成属联中的学生党支部最为活跃。

省工委学委成立后，抓了三件大事：

1. 川大国民党CC、复兴社等反动势力捏造“稻草案”，企图打击我党在川大的组织及所领导的救亡运动，集中火力攻击康乃尔、王怀安（川大救亡团体的领导人，但尚未入党）。学委召开会议，认真讨论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阴谋陷害活动，并配合法律手段，终于获胜。

2. 一九三八年三月（韩天石尚未调任成都市委书记之前），

省工委决定派张文澄等赴武汉参加全国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在一九三八年党中央三月政治会议之后）。会后，他们回到成都，进行了广泛的传达，进一步鼓舞和掀起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记得当时韩天石曾对我说，本应派我去参加全国学代会，因为我是学委宣传部长，考虑到不能离开学校太久，所以才改派张文澄去参加。

3、一九三八年六月，组织领导全市学生救亡团体欢迎国际学联代表柯乐满等五人的活动，省工委学委决定由我和张文澄负责，当时华大的周曼如，协合中学的陈××出力最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派某大学校长到飞机场欢迎国际学联代表并致欢迎辞，以后又允许公开活动等。国际学联代表访问和公开讲演等活动，对成都的学运影响很大。

省工委学委成立后约四个月，为宣传和推动全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展舆论阵地，“四川青救”就着手筹备将《救亡周刊》扩大改组为《战时学生旬刊》（简称“战学”）并于五月二十日在祠堂街九十六号正式出版。学委书记康乃尔出主意，通过上层关系聘请戴传贤、陈炳光、向传义等六人（以后又增加何其芳，曹葆华等）为名誉理事作掩护，使敌人和中间分子摸不清我们的政治背景。“战学”成立时，本来决定由王大明（即陶然）任社长，但实际是由康乃尔负责全面行政工作，我领导“战学”的党支部。《战学》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它既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内容，也有知识性的内容。常异同志撰写国际论文、时事论文。最后两页是清华大文幼章教授和×××（通过华大周楠找的一女同志，已记不得姓名）编撰英语知识（抗日救亡的内容）。蒋汇泽（明明）、王世煥（林青）、李亚群（小亚）和我（非我）等经常为它撰写文章和诗作。李亚群同志就曾以小亚为笔名写了《战时情书》，描写以前艰苦斗争中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操，十分生动，鼓舞人心。蒋汇泽的文章也较多，大部分是谈青年思想及救亡理论方面的。另外还有以诗

歌、剧本、快板等形式出现。一九三八年六月，李亚群同志调泸县建党，刘炎接着任主编。一九三九年调走刘炎后，由王元担任主编，直到一九四〇年。《战学》的发行量达两千至三千份，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

由“救亡周刊社”改组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社”，除以原来的“救亡周刊社”及其赁书部为基础外，新增加了川大、中华女中、协进中学、建国中学等三百多同志参加了该社。“战学社”内有党的支部，由我分工领导，吴德让作支部书记，刘炎、董仲平作支委。九月，我去武汉大学学习后，刘炎任书记，洪润芳、董仲平作支委。杨静（杨毓同）入党后，也参加支部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撤销学委后，“战时学生旬刊社”的党支部改属成都市委南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是余中。

“战学社”也成立过“战学抗敌宣传团”，经常组织社员上街下乡（主要是星期天）搞歌咏、话剧、街头剧等救亡宣传活动。在社内组织救亡理论、大众哲学、抗战形势等学习。还成立了木刻组，由王大化负责（原天津人美出版社社长郭钧即是当时开始学的，已死）。由王大化教唱歌曲，并成立了歌咏组。还有戏剧组，我与王大化就共同演了一出话剧，主演是谢持，剧名大概是《铁棒棒》。

“战学社”在当时学生救亡组织中是影响最大、最有声势的一个团体。有一次，贴出海报，公开欢迎军训同学归来的欢迎会，国民党政府派员来制止。当时是康乃尔和我负责，便与派来的人员做工作，争取了他的同情，但他又不敢违背上面指令。康乃尔趁他处于矛盾之际，便请他到隔壁房间招待烟茶并进行谈判。我便马上将会场改为圈形的联欢会形式，我主持会议，还讲了十几分钟的话，并用唱歌的声音作掩饰（王大化还唱了苏联的歌曲）。在会议间歇中由同学们自由发言。整个会场十分活跃，但不像开会的样子，国民党的派来的人员也无可奈何而去，我们则胜利结束了。